

# 论“大数据”时代背景下译者 主体性的动态变化趋势

孙 阳, 王 永

(西南石油大学 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500)

**摘要:** 基于“大数据”时代对翻译环境的变化,重点论述译者主体性在此背景下的动态变化趋势,结合翻译理论,分析其内部逻辑性和规律性,揭示“大数据”时代背景与译者主体性变化的因果关系,总结译者主体性变化的动态趋势,以期抛砖引玉,为“大数据”背景下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带来更多的思考和探索。

**关键词:** “大数据”时代;译者主体性;动态变化趋势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7)03-0134-05

## The Dynamic Variation Trend of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Era

SUN Yang, WANG Y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5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Big Data Era, based on the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bulk data handling techniques, human society has seen significant changes and the translation circle cannot be free from the influence. The analysis begins with influences of the big data technology on the translating activities. In the next section of the paper, the discussion and study focus on “the dynamic variation trend of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Era”. Combined with translation theories, the discussion attempts to analyze its internal logic and regularity in the dynamic variation and the causal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Big Data Era and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which will be revealed clearly. In the last discussion, the core of this paper will be demonstrated in details. Above all,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inspire more researchers to study the new matters and reflect upon new issues related to the translation activitie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Era.

**Key words:** Big Data Era;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dynamic variation trend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本质上是一种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它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发生深刻的变革。毫无疑问,翻译活动受之影响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目前不可否认的是译界对于“大数据”与翻译相关思考和研究均较少涉及。鉴于现状,笔者深入研究“大数据”时代与翻译活动的关系,从“大数据”时代对翻译的影响起笔,以译者主体性作为切入点,重点论述“大数据”时代背景下译者主体性的动态变化趋势,以期有所收获,敬献拙见。

收稿日期: 2017-03-28

作者简介: 孙 阳(1964-),女,山东陵县人,西南石油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翻译。

王 永(1984-),男,山东滕州人,西南石油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翻译。

## 一、“大数据”时代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近年来,“大数据”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全球著名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这样感叹:“数据已经渗透到当今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成为重要的生产因素;人们对于大数据的挖掘和运用,预示着新一波生产力增长和消费盈余潮的到来。”<sup>[1]</sup>“大数据”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已产生并将继续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这将对人们的思考模式、处理问题的方式产生重大的变革。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对翻译活动产生的影响将是深远的。陈善伟在《翻译科技新视野》一书中这样感慨:“人类进入21世纪,逐渐认识到科技能够推动消除地区间长期以来形成的语言沟通障碍;随着电脑科学和翻译技术的迅速发展,几十年后,极有可能世界不再有巴别塔,人类可以毫无障碍地进行沟通。”<sup>[3][pvi]</sup>因此,译界必须结合“大数据”背景下的人文社会实际,同时结合“大数据”的应用机理和翻译的自身特点深入地研究、探索并密切关注译界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新动态,以推动翻译事业,完成新的历史使命。“大数据”的应用和推广深刻影响着翻译活动,同时这种影响也直接传递到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继而导致其主体性的动态变化,最终再次引起翻译活动的变化。

多元系统理论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视为系统而非由各种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这些系统并非单一的系统,而是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系统,这些系统各有不同的行为,却又相互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sup>[4]</sup>可知,语言翻译作为“一种社会符号”必然和社会其他系统“相互依存”且“整体运作”,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系统的影响。方梦之认为“人类的翻译活动是在一定的翻译环境下进行的,翻译生态场和翻译环境存在着水乳交融的紧密联系。”他给翻译生态环境下的定义是“影响翻译主体生存和发展的一切外界条件的总和”,翻译生态环境主体是广义的,囊括了在翻译活动中参与的全部生命体,具体包括原文作者、译者、读者、编辑、赞助人、出版商、营销商等。<sup>[5]</sup>

根据以上陈述,翻译活动必然与“大数据”这个时代“组成系统”、“整体运作”、“紧密联系”。从“大数据”时代对翻译影响的角度,笔者认为,“大数据”的影响涉及翻译活动的全过程和各种要素,为明确研究方向,笔者仅论述受其影响最突出的三点:(1)通过“大数据”分析处理技术的运用和推广实现了译者和读者供需双方的准确定位,使读者和译者能够“面面”完成翻译活动。通过“大数据”的分析技术,译者可以实现对目标读者需求信息的“清晰勾勒”,从而有效降低翻译活动的盲目性,能更有针对性地完成读者需求的翻译活动,译者完成的译作将不会出现“无人问津”的现象。在“大数据”时代,无论是以出版社为主的赞助人还是译者本身,都能基于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技术最终获得准确的读者信息,使市场经济下翻译活动中的人力、物力资源得到高效配置。对于翻译活动而言,翻译文本可分为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对于译者而言,通过“大数据”技术分析译者可了解读者的许多信息,如阅读题材、文本类型、兴趣、目的、动机、价值追求、年龄层次等,译者“看得见”潜在的目标“读者”。据统计,在各国翻译市场上,非文学翻译文本数量占翻译总量的95%,非文学翻译自身通常具有明确的目标“读者”,译者可通过“大数据”确定潜在“读者”的能力;(2)“大数据”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将极大地提升语料库建设的水平,提升机器翻译的质量,加速翻译的产业化。基于“大数据”的存储、分析、提炼和智能处理技术,译界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将有价值的双语、多语文本储存(比如:通过数据分析处理技术把在特定语境下译者使用频率高、权威度高的次字、词、句、篇存入语料库),加速语料库建设的专业化、大型化、规范化、智能化,同时为翻译软件的开发奠定后备资源,实现由“电脑辅助人工翻译”向“人工辅助机器翻译”过渡,逐步实现“全自动机器翻译”。在这种客观形势下,必然进一步节省劳动成本,加快周转时间,提高翻译效率,加速翻译的产业化进程;(3)在“大数据”时代,翻译活动的“多元化”“个性化”趋势凸显,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共性化”因素的影响呈现弱化态势。翻译活动面向的是全球范围内的跨文化交流,通过推广和应用“大数据”分析处理技术,译者可获取来自多元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目标读者信息,并可根据读者的偏好提供“私人订制”内容,从而凸显翻译活动的“个性化”。

## 二、译者主体性及其影响因素

### (一) 译者主体性

许钧认为“翻译是复杂的文化交流活动,承担着精神交流的中介作用,译者的作用不可忽视,作为桥梁,翻译的首要职能是沟通。因此面对作者和读者,面对出发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译者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应采取怎样的沟通方式,是翻译研究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sup>[6](p11)</sup>他阐明了研究译者主体性对于研究翻译活动的重要性,研究翻译活动必须抓住译者这个关键因素。但从中西翻译史来看,传统翻译观将翻译理解为不同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相应地译者自身的主观性在翻译过程中的建构作用被忽略,译者地位也一直处于边缘化。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哲学出现语用学转向和90年代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翻译界拓宽了研究视野,摆脱了源语中心论的约束,开始把译语作为研究中心,相应地,译者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从边缘逐渐走向中心,译者也基本确立了翻译活动的主体地位。国外学者贝尔曼指出,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目的、选取的翻译立场、译者制定的翻译方案,以及他选取的翻译方法都让译者成为整个翻译活动过程中最积极的因素,他的态度、方法和立场一旦确立,他译出的“每一个字都成为了一种誓言”。<sup>[7](p75)</sup>这里贝尔曼强调了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对于译者主体性的定义,笔者认同目前国内学者的主流观点,“译者主体性主要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而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译者主体性贯穿在翻译的全过程”。<sup>[8]</sup>译者主体性不仅体现在语言层面对源语文本的理解、阐释,还包括译者对源语文本的选取、翻译目的、动机和策略、技巧、译者有意无意的调节自己、作者和读者的关系、译者的风格、价值观、伦理观等。译者主体性具有目的性、能动性、受动性和创造性。

### (二) 译者主体性的影响因素

翻译活动中最活跃的部分是译者以及译者主体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译者的自由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是肆意的。译者主体性发挥不当会产生胡译乱译的现象。勒菲弗尔认为,译者在翻译时会受到其所处时代文学传统以及源语和译语语言特征的影响,并指出“翻译绝不是在真空中所产生,也绝不是在真空中被接受”。<sup>[9](p3)</sup>生态翻译学认为,应“着眼于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sup>[10](p10)</sup>去认识翻译过程中译者能动性与外在环境的关系。“作为语言信息转换的翻译生产过程,……翻译行动中的各个行动者,是在相互协商、相互作用下,形成的一个翻译网络,并为实现翻译的目的而共同维系着这个网络”。<sup>[11]</sup>他具体地阐明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与翻译内部其他因素之间的制约关系。当然,对于译者而言,无论是主动地操纵这些影响因素的过程,还是被动地变通这些影响因素的过程,实际上都是译者主体性发挥的过程。译界的影响因素归为两类: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外在因素是指超出译者自身所能掌控范围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具有“社会性”的烙印,包括社会、文化语境、意识形态、生产力因素、赞助者和目标读者等因素。具体包括:特定生产力条件下社会发展趋势、科技发展水平、开放程度、主导价值观、民族文化倾向等。关于外在因素对译者的影响,许钧认为“主要作用于对拟文本的选择,也就是‘译什么’的选择”。<sup>[6](p157)</sup>也就是说,外因影响译者面对特定的目标读者如何进行选材。当然这些因素并非孤立地影响和制约译者主体性,它们之间相辅相成共同影响译者的翻译活动。内在因素通常指能够为译者个体所掌控的影响因素,包括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观念、语言关系、翻译能力。其中许钧这样评价翻译动机“因为在翻译的所有因素中,最活跃且起着决定作用的,是翻译的主体因素,而译者的动机,是体现翻译主体因素的重要部分。”<sup>[6](p157)</sup>内在因素具体包括:译者翻译目的、风格、语言驾驭能力、伦理道德、价值观、文化立场等。

## 三、“大数据”时代译者主体性的动态变化趋势

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内外因素均受“大数据”的影响,因此,译者主体性自身也发生相应的变化。为明确研究方向和重点,笔者将着重分析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译者主体性呈现的动态变化趋势:

第一,译者在考量“作者”和“读者”的天平时,更倾向于将砝码移向“读者”,实现重心的读者化转

移,围绕“读者”这个中心完成翻译活动。德国学者弗米尔创立的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的目的是翻译实践中最重要的因素,在其理论框架中,“决定翻译过程的最主要因素是整体翻译的目的”,<sup>[12] (p34)</sup> 并基于其“翻译不单是纯语言的转换”的认识,坚持认为“翻译目的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译文读者”。译者应关注翻译的目的和读者的需求,如果没有读者,翻译活动便没有意义。从市场经济角度考虑,翻译作品作为一种有价值的“商品”,只有“读者”购买才能实现其翻译作品的价值,同时这也构成了译者自身的动机或目的。“大数据”分析处理技术的应用使潜在翻译客户和需求群体的准确定位成为可能,实现读者和译者的“面对面”接触,对于从事文学翻译的译者来说,凭借“大数据”提供的潜在读者的信息,如阅读题材、文本类型、兴趣、目的、动机、价值追求、年龄层次等,可清晰地勾画出潜在目标“读者”的需求,继而判断出哪种或怎样的“目标文本”更符合读者需求和品味。所以,在“大数据”的背景下,译者在选材和选择翻译策略及翻译技巧时只需围绕“读者”这个中心进行。甚至,译者可以对源语文学文本内容的篇幅长度、角色定位、文体风格、情节发展等方面,根据清晰化的目标“读者”需求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进行调整。目前,“大数据”对于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影响已现端倪。以美国著名的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翻译的《狼图腾》*Wolf Totem*为例:企鹅集团作为西方的文化产业巨头,于2008年在纽约、伦敦推出了《狼图腾》的英文版,但在推出之前该公司通过数据分析出美国读者对中国文学需求的结构状况、价值定位,然后才决定与长江出版社合作,并依据数据分析出美国等英语为母语读者的“兴趣、偏好”,译者葛浩文在翻译时进行相应的删减,应用翻译策略和技巧,迎合目标读者的需求。对于非文学翻译来讲,由于原理类似,笔者在此不再赘述。

第二,译者个人翻译风格逐渐淡化,语料“组装员”的身份开始凸显,侧重于通过“大数据”进行语料选择,“组装”完成文本翻译。胡庚申教授提出了翻译适应选择论,如从“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出发,认为翻译是译者为适应翻译的生态环境而进行的选择活动,翻译是以译者为中心,是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译者为“求存”而“择优”。“适应”表现为:译者对自身需求、能力及生态环境的适应,进而进行选择。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推广和应用,翻译领域将形成高水平翻译记忆软件、高质量的平行文本、丰富准确的语料库和翻译高度产业化。译者面对定位清晰的目标读者,在时间效率的压力下,在丰富而准确的“平行文本”语料库的优势资源下,为“适应”这种局面,无需“字字”翻译出全部源语文本,可能“选择”储备在语料库中的“平行”语料进行“组装”,最后形成目的语文本呈现在读者面前,而这种译本已不是具有译者自身语言风格的文本。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变化主要适用于非文学文本,对文学文本来说,译者虽不可能完全依靠语料“组装”来完成翻译,但是“大数据”背景下的语料库可以提供高价值的参考文本。

第三,译者对源语文本的认知方式发生改变,从译者个人主观化向基于数据实证模式的客观化转变,进而化解翻译过程中出现的语言文化认知困境,减少翻译信息表达的失误,提高翻译质量和效率。在“大数据”时代到来之前,当译者对于源语和目的语的认知理解存在不确定性时,往往依据主观直觉、经验和推理进行概念设定,缺乏有效的实证,从而容易导致信息传递的失误。功能目的论对翻译失误的定义为“如果翻译的目的是实现某种服务于译文预期读者的功能,那么任何妨碍实现翻译目的的翻译方法(或结果)就是翻译失误。”<sup>[13] (p74)</sup> 主流学者指出,“功能理论下的翻译主要是由于译者在生成和选择文本两方面的能力不足造成的”。<sup>[14]</sup> 不难看出,这里的“能力不足”背后反映出的原因就是译者主观化认知模式,缺乏有效的客观实证和确认。而“大数据”则可提供客观的数据分析处理技术,为译者准确理解语言文化、解决困惑提供了客观依据,有效提高了翻译的质量和效率。对此,陈善伟认为“这个改变很重要,因为由此翻译研究已从个人主观性质转移为基于数据的客观性质。”<sup>[3] (p328)</sup>

第四,译者开始构建更具意义的普世翻译伦理观,以回应“大数据”时代多元价值观的读者需求,完成特定翻译活动。意识形态操控论的提出者、翻译学者勒菲弗尔在《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控》一文中提到对翻译有影响两个主要因素:一是意识形态因素;二是诗学因素。他认为包括文学在内翻译活动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由翻译家和评论家等组成的“专业人员”,另一个是权力拥有者,他们能促使或者阻止文学等的翻译活动,其组成人员主要包括政党和出版社等,勒菲弗尔称之为

“赞助人”。“赞助人”侧重于对意识形态的关注,而“专业人员”则关心诗学,译者对意识形态可能持赞同态度,也有可能是“赞助人”强加而产生的屈从认可,这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受到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影响。“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加速了国家间、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推动了全球内文化意识形态交流的热络(其中包含融合和冲突),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政治对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在下降。译者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先导,开始构建更具普世意义的翻译伦理观,其核心点就是在尊重读者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前提下,最大化反映原作客观面貌,这其中便包涵原作的文化价值倾向,以回应读者的需求,因此,译者构建“普世翻译伦理观”更具“操控”意义。

#### 四、结语

笔者对于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译者主体性动态变化趋势的研究主要立足于翻译活动在“大数据”广泛应用的时代背景下呈现的新特点,重点论述在此背景下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在进行翻译活动时所表现的新动态,结合翻译理论探讨“大数据”与译者主体性二者的主客观关系,认为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数据分析处理技术引起翻译的客观环境发生变化是“因”,译者主体性变化的新动态是“果”,二者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和规律性。“大数据”的应用和推广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对于译界的影响也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分析和研究其中的规律,把握“大数据”带来的机遇,必将有利于翻译事业的大繁荣。

#### 参考文献:

- [1] Manyika J, Chui M, Brown B, Bughin J, Dobbs R, Roxburgh C, Byers AH. Big Data: The Next Frontier for Innovation, 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 [EB/OL]. 2011. [http://www.mckinsey.com/insights/business\\_technology/big\\_data\\_the\\_next\\_frontier\\_for\\_innovation](http://www.mckinsey.com/insights/business_technology/big_data_the_next_frontier_for_innovation).
- [2] 季羡林. 季羡林先生的贺词[J]. 中国翻译 2005 (1).
- [3] 陈善伟. 翻译科技新视野[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 [4] 埃文-佐哈尔. 多元系统理论[J]. 张南峰译. 中国翻译 2002 (4).
- [5] 方梦之. 论翻译生态环境[J]. 上海翻译 2011 (1).
- [6] 许钧. 翻译论(修订本) [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 [7] Antoine Berman. *Pour une Critique Des Traductions: John Donne* [M]. Paris: Gallimard, 1995.
- [8] 查建明, 田雨. 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 中国翻译 2003 (1).
- [9] Bassnett S & A. Lefevere.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10]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解读[J]. 中国翻译 2008 (6).
- [11] 黄德先. 翻译的网络化存在[J]. 上海翻译 2006 (4).
- [12] 克里斯蒂安·诺德. 译有所为——功能翻译理论阐释[M]. 张美芳, 王克费主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
- [13] Nord C. *Translation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14] 王军平. 翻译错误的界定、评估以及对翻译教学的启示[J]. 外语研究 2014 (3).

(责任编辑: 舒娜)